

中国共产党消费政策百年变迁：轨迹、动因与逻辑

谭 顺 郭 乾

〔摘要〕 一百年来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进行革命、建设与改革，实现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历史飞跃。在这一波澜壮阔的历史征程中，中国共产党消费政策发生了历史性变迁，依次经历消费自给、消费抑制、消费放开、消费扩大、消费升级及消费提质等发展阶段。这一变迁与演进固然是中国经济发展的结果，更是中国共产党在不同阶段对消费性质定位的体现：在革命战争年代，消费保障战争需要；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消费由生产增长的约束转变为生产增长的结果、条件及手段，进而上升为经济发展的目的、人的发展的现实方式。应当说，中国共产党消费政策的历史演进，不断推进生产发展、消费发展，进而推进社会主义条件下人的现实发展，实现共同富裕，这与中国共产党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与初心始终是一致的。

〔关键词〕 中国共产党；消费政策；消费性质；人的发展；高质量发展

〔中图分类号〕 F120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4769 (2022) 04-0027-09

引言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我国经济的持续发展、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建立，学术界开始关注消费政策研究，在研究内容上可以分三个方面。第一，消费政策理论研究。20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学术界主要研究消费政策的性质、原则、手段等基础理论问题^①，阐释消费政策在经济政策体系中的地位及作用、消费政策与生产政策的区别与联系，构建消费经济学学科^②，并把消费理论与社会主义制度结合起来，探索构建社会主义消费理论。^③第二，消费政策实践研究。党的十四大以来，学术界主要研究我国现实消费政策的制定、实施及发展趋向，其中重点研究三个方面的问题：一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与我国消费政策^④；二是经济转型与我国消费政策^⑤；三是扩大居民消费的具体政策及长效机制。马伯钧等从增强消费主体消费力、提高消费主体的消费倾向、推进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保障消费安全等方面

〔作者简介〕 谭顺，山东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山东 淄博 255000；

郭乾，大连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辽宁 大连 116024。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后期资助项目“马克思消费力理论及其当代价值”（19FKSB006）

① 高纪翰 《试论消费政策》，《商业经济研究》1985年第6期。

② 参见尹世杰 《社会主义消费经济学》，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

③ 何炼成 《试论社会主义消费经济学》，《西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0年第1期。

④ 杨承训 《发展市场经济必须调整消费政策》，《马克思主义与现实》1993年第1期。

⑤ 陈新年 《消费经济转型与消费政策——关于如何进一步扩大消费的思考》，《经济研究参考》2003年第83期。

梳理了我国扩大内需的理论和政策。^① 第三，消费政策历史研究。21世纪以来，学术界开始重视消费政策的历史研究，系统总结党和国家消费政策的基本经验。有的研究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消费需求和消费政策的变化^②，有的研究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消费政策的变化^③，也有学者聚焦于特定历史时段的消费政策研究，如范建平提出鼓励消费应是“十五”时期居民消费政策的基本取向。^④ 这些研究大多聚焦于新中国特定时期的消费政策解读，或较为注重对一定历史时段消费政策的梳理与概括，但较少关注政策变迁的内在动因。建党一百周年及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以来，系统阐释中国共产党消费政策历史变迁的成果逐渐呈现，毛中根等研究认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居民消费发展是“经济发展的自发式升级与自觉式消费调控相交融”的历史进程，推进这一进程的内在动因在于“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取向”。^⑤ 本文则依据中国共产党在不同时期对消费性质的定位揭示政策变迁动因，从消费与生产关系、消费发展与经济发展关系、经济发展与人的发展关系，透析中国共产党消费政策的演进逻辑：即消费由生产的结果、手段、目标上升为人的发展方式。

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创立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明确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必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推动人的全面发展、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⑥ 满足人民的“美好生活需要”，推动人的全面发展、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需要探索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条件下消费发展与人的发展的结合。对此，习近平强调指出“共同富裕本身就是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一个重要目标。我们不能等实现了现代化再来解决共同富裕问题，而是要始终把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新期待作为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在实现现代化过程中不断地、逐步地解决好这个问题。”^⑦ 本文从消费发展与人的发展本质联系的视角，在对中国共产党消费政策进行历史梳理与归纳的基础上，重点揭示中国共产党百年消费政策变迁的动因与逻辑、规律与趋势，以便立足中国经济发展实践，探究生产发展、消费发展与人的发展的良性互馈机制的确立及构建。

一、消费自给政策：消费优先保障战争需要（1921—1949年）

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的主要任务是以武装斗争推翻“三座大山”，争取民族独立与解放，逐步探索和形成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道路。为此，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革命武装长期面临战争考验，在国内外反革命敌人封锁的困境中，只有依托革命根据地建设，立足于自给自足才能够在严酷战争环境中生存下去。因此，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推行消费自给政策，正如毛泽东在1942年指出的，“国民党政府对于我们的军队，初则只给很少的一点饷，继则完全断绝，边区也被封锁，迫得我们不得不从事生产自给，维持抗战的需要”。^⑧

第一，依托农村革命根据地，建立工农革命政权。1927年10月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军队创建第一个革命根据地，到1930年在全国10多个省300多个县建立了15个农村革命根据地；1945年抗战胜利前夕，全国已有19个大的解放区，人口达9950万。^⑨ 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成立苏区政府，

① 参见马伯钧、张治觉、邝小文、何昀《扩大国内消费需求的经济理论和政策研究》，长沙：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2020年。

② 参见房爱卿主编《我国消费需求发展趋势和消费政策研究》，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2006年。

③ 韩英《改革开放30年我国消费政策的演变与未来政策构建》，《市场论坛》2008年第11期。

④ 范剑平《“十五”时期我国消费率变动趋势与消费政策选择》，《经济纵横》2000年第12期。

⑤ 毛中根、贾宇云、叶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百年居民消费：进程回顾、思想变迁与民生实践》，《改革》2021年第9期。

⑥ 《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北京：人民出版社，2021年，第24页。

⑦ 习近平《论把握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21年，第503页。

⑧ 《毛泽东文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460页。

⑨ 董辅初《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上卷，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1999年，第19页。

建立工农武装政权；在抗日战争时期，成立边区政府，建立民主联合政权；在解放战争时期，成立解放区人民政府，建立人民政权。依靠革命政权力量，推进根据地建设，集中人力物力财力保障革命战争需要。

第二，开展土地革命，发动农民支援革命斗争。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1928年颁布《井冈山土地法》，将一切土地收归苏维埃政府，分配给农民耕种。在抗日战争时期，实行减租减息政策，调动农民生产积极性。到解放战争时期，在解放区进行土改运动，全面废除封建土地制度，没收封建地主阶级的土地归农民所有。1947年10月中共中央颁布《中国土地法大纲》，到建国前夕约有1亿农民分得约3.75亿亩土地。^①通过土地革命变革封建土地关系，发动农民广泛参加革命队伍，同时为革命战争提供有力的经济支持。

第三，开展大生产运动，提高根据地自给能力。1939年中共中央在延安号召边区军民开展大生产运动，军队不仅是战斗队，而且是生产队，“所有我们的军队，搞饭吃，做衣服，修房子，盖大礼堂、小礼堂，做桌椅板凳，一概都是自己动手，这都是经济”。^②与此同时，开办医院、银行、弹药厂、机械修理厂、炼铁厂、被服厂等，不仅生产生活必需品，还生产武器、弹药等军用物资，除直接供应根据地军民之外，部分用于到敌占区换取根据地极其匮乏的军需物资及食盐、布匹、药材等。进入解放战争时期，1946年晋冀鲁豫全边区年产布匹5000余万斤，其中太岳区大部自给，太行区全部自给，冀南、冀鲁豫自给有余。^③

第四，采用灵活多样的消费自给办法，最大化利用有限物力财力。由于长期处于战争环境，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革命武装并未形成统一的消费分配政策，而是根据各地实际状况创造多种灵活消费方式：优先保证战争需要，优先保证战斗人员的需要，优先保障救治伤病员的需要；为最大化利用有限物质资源，采取限量分配生活消费品的办法；在物质供给极端匮乏、极不稳定的战斗环境中，为保证革命队伍的最低生存需求，甚至采取平均分配的办法。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队伍推行军民平等、官兵平等的经济民主政策，保证了革命队伍能够按照最低生存需要配置必需品，最大程度保证了革命队伍和革命战争的需要。

长期处于战争环境，革命根据地被分割、包围与封锁，在客观上促成了中国共产党实行消费自给政策，中国共产党把消费定位为保障战争需要，“一切为了战争，一切服务于战争”是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消费政策的核心与底线。1933年毛泽东在谈到中央苏区必须注意经济工作时明确指出“在现在的阶段上，经济建设必须是环绕着革命战争这个中心任务的。”^④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的消费自给政策具有以下特点：一是在国内外敌人的经济封锁、武装剿杀的极端残酷的战争环境中，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革命武装被迫选择生产自救、消费自给政策，自力更生以求得生存。二是这一时期的消费自给水平极端低下，为优先保证战争需要，在很多方面不得不降低根据地军民基本消费需求，甚至在极端条件下无法保证最低程度的生存性消费需求。三是这一时期中国革命的主要任务是推翻“三座大山”，争取民族独立与解放，为此必须以革命的武装斗争反对反革命的武装镇压，消费自给政策最大程度保存了革命武装力量、最大程度保障了革命战争的需要。

二、消费抑制政策：消费是生产增长的约束（1949—1978年）

新中国成立初期面临国内外政治、经济、军事、科技、文化等全方位考验，加快发展生产、巩固新生政权成为一项迫切任务。因此，中国共产党确立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实行“重积累、轻消费”“先生产、后生活”的消费抑制政策，对消费品的生产、调配、营销、消费等各个环节进行全面控制。

一是控制居民消费，集中有限财力投入生产建设。“重积累、轻消费”是这一时期党的消费政策的核心。“一五”至“四五”期间我国的积累率由24.2%上升至33.0%，消费率则由75.8%下降到67.0%；而在积累内部，非生产性积累持续降低，由40.2%下降到22.4%，“结果住宅、教育、文化、

① 中国人民大学政治经济学系《中国近代经济史》下册，北京：人民出版社，1978年，第212页。

② 《毛泽东文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150页。

③ 中国人民大学政治经济学系《中国近代经济史》下册，第242页。

④ 《毛泽东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23页。

卫生、环保设施等方面大量欠债，给人民生活造成很大困难”。^① 对此，1979年李先念在中央工作会议上对“积累和消费的比例严重失调”的问题做了系统总结与评价：“建设了一大批工厂，‘骨头’搞起了，‘肉’没有相应地跟上去。……看来，积累率是过高了，‘骨头’和‘肉’的关系也没有处理好。”^②

二是关闭自由市场，实行消费品计划供应。1950年中央人民政府颁布《关于统一国家财政经济工作的决定》，对全国财政收支、物资调度、现金使用实行统一管理，标志着我国财政经济工作由分散管理进入统一管理的历史新时期。在“五反”运动中对民族资本主义经济进行整顿，限制其唯利是图的本性，实行统购统销，将其纳入计划管理中，“到1952年底，全国基本上形成了一个从管理到经营、从批发到零售、从上到下一套比较完整的包括各种门类的国营商业系统”。^③ 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后，1957年国务院出台《关于改进商业管理体制的规定》，在人民公社化运动中，城乡小商小贩向国营商业过渡，关闭自由市场，从而改变了商业领域各种经济成分并存的局面，基本上形成国营商业独家经营局面。

三是严格管控物价，采取国家统一定价方式。1953年中共中央颁布《关于实行粮食的计划收购与计划供应的决议》，对粮食实行统购统收，此后中央人民政府又对油料、棉布实行计划收购和计划供应以及棉花的计划收购，以此调节供需关系，稳定市场物价，保障人民生活和国家建设。1956年国务院规定：烤烟、黄麻、苕麻、大蒜、甘蔗、茶叶、家蚕茧、生猪、羊毛、牛皮、土糖、土纸、废铜、废铝、废锡、若干种药材、供应出口的水果和水产品，都必须由国营商业或供销社统一收购。统购统销政策的实行，使我国指令性计划调节的覆盖面从工业生产领域扩展到农业生产领域，从生产决策扩展到消费决策。

四是推行票券限量供应，控制居民生活消费增长。1955年国务院发布《市镇粮食定量供应暂行办法》，对非农业人口一律实施居民口粮分等定量的供应制度，居民购买粮食需要使用粮票。1958年中共中央通过《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问题的决议》，掀起人民公社运动的高潮，逐渐废除工资制，恢复供给制。由于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使得日用必需品和副食品供应严重不足，1959年中共中央发出紧急指示，要求大力压缩公用开支和社会购买力，控制和压缩粮食和食油销量，规定在城市继续实行粮油定量供应制度，并适当降低居民供应标准，压缩粮食销量1/10左右。1961年中央规定对粮食、棉布等18类基本生活必需品实行平价定量供应，在稳定职工生活的同时，对于糖果、糕点、自行车、钟表、茶叶、针织品等部分消费品则实行高价销售政策。

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推行消费抑制政策，固然是由于我国生产落后、不能满足居民基本生活需求，在供给严重短缺的条件下而被迫采取的消极政策，但深层次上则是与这一时期把消费定位于生产增长约束的理论认识有关。1956年党的八大提出“为了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全国人民必须使当前利益和个人利益服从长远利益和集体利益，艰苦奋斗，克勤克俭，在发展生产和提高劳动生产率的基础上增加国家的资金积累”。^④ 这在一定程度上把消费与生产对立起来，由此引发显见的政策效应：限制消费，积累资金，以支持大规模建设投资，造成生产与消费脱节，生产发展并未带来相应的消费发展，反过来又制约生产的稳定发展，从而积聚严重的经济社会问题。

三、消费放开政策：消费是生产增长的结果（1978—1998年）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为我国确立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大力发展生产力，社会供给增长迅速。为此，中国共产党调整消费政策，从消费抑制转向消费放开，居民消费获得大幅度增长，根本改变消费严重落后于生产的状况。

第一，发展市场经济。改革开放以来，为适应生产力发展需要，我国积极推进市场化取向改革。1984年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提出“社会主义有计划商品经济”，1987年党的十三大提出“国家调节市

① 董辅礪 《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上卷，第579页。

②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82年，第101页。

③ 董辅礪 《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上卷，第103页。

④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9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第297页。

市场，市场引导企业”的经济运行机制，1992年党的十四大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逐步恢复与发展市场经济，对于搞活经济、丰富供给、保障居民生活消费发挥了重要作用。到20世纪80年代末我国居民生活实现温饱，基本生活消费需求得到保障性满足，市场基本实现供求平衡，长期供不应求状态得到根本缓解。

第二，放开物价管制。1985年中共中央发布《关于进一步活跃农村经济的十项政策》，规定除个别品种外，国家不再向农民下达农产品统购派购任务，按照不同情况分别实行合同订购和市场收购，放开城市蔬菜、肉类等主要副食品收购价格，绝大部分农产品的价格由市场调节。到1988年，在社会商品零售总额中，国家定价的比重为29%，国家指导价部分占22%，市场调节部分占到49%。1992年以后，逐步废除价格双轨制，居民生活消费品由政府配给到市场供给迈出决定性一步。

第三，开放城乡市场。随着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城市国有企业经营体制的改革，城乡经济出现繁荣发展的局面。因此，一些省份开放和恢复了过去被强行关闭的集市，到1982年底全国农村集市已达41184个，成交额从1978年的125亿元增至287亿元，集市规模、贸易内容和形式及集市功能都发生了根本变化。1979年国务院决定原则上开放城市农贸市场，1980年5月政府允许在市区内适当地点建立农贸市场，并纳入整个城市商业网点，农产品市场建设逐步启动。

第四，取消定量供应。随着生产供给能力的大幅度提高，国家取消对消费品的限量消费政策。1983年国家正式取消了实行20多年的布票，此后陆续取消肉票、油票、粮票等，通过票券控制居民定量消费的历史终结。随着城乡集贸市场的发展，消费品的供应量更充足，花色品种更多，而且购买也更方便，城乡居民生活必需品需求到80年代中期已基本得到满足，实行多年的配给式供应逐渐被自主性消费取代。

改革开放之前，由于实行消费抑制政策，客观上隔离了生产与消费的关系。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生产发展及供给条件的改善，客观上创造了生产与消费相互作用的前提条件。按照马克思的社会再生产理论，社会总生产过程包括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四个环节，其中生产是起始环节，而消费是末端环节，二者的根本关系是生产决定消费，体现为生产什么即消费什么。因此，在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对消费的性质定位为消费是生产的结果，正如邓小平指出的，“我们只能在发展生产的基础上逐步改善生活”。^①“经济发展了，有了条件，收入就可以高一点，消费就可以增加一点，这是合乎发展规律的。”^②

在此期间我国生产与消费均以数量增长、规模扩张为主要特征。在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市场供求趋于平衡之后，生产仍保持惯性增长，为此积累并引发供求矛盾。一方面，生产保持强劲增长势头，在80年代末至90年代中后期，由供给短缺历史性转向供给过剩。另一方面，居民消费仍以基本生活消费为主，虽然80年代中后期之后的耐用品带来排浪性消费增长，但总体上居民消费结构仍然较为初级，在基本生活需求获得保障性满足之后，消费结构未能有效升级，导致社会需求增长速度趋缓，由此拉大供求差距，进一步积聚市场供给过剩矛盾。

四、消费扩大政策：消费是生产发展的手段（1998—2008年）

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受此影响，我国1998年发生历史性消费不足，市场出现严重商品滞销，由供给短缺进入供给过剩时代。为此，“中央审时度势，及时调整政策，作出了扩大内需等重大决策，并将扩大国内需求、开拓国内市场作为我国国民经济发展的基本立足点和长期战略方针”。^③对抗消费不足成为我国经济治理的重要任务，也由此推动中国共产党转向消费扩大政策。

第一，开拓消费市场。我国二元经济结构特征突出，城乡、工农、地区三大差别决定了市场发育及发展的不平衡，这在客观上也为我国开拓消费市场提供了巨大空间。2000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出台《关于促进小城镇健康发展的若干意见》，提出发展小城镇，有效带动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和房地产业的发展，提高农民消费的商品化程度，扩大对住宅、农产品、耐用消费品和服务业的需求。同年，《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个五年计划的建议》提出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2006年取消农业税，全国农民每年减轻负担1335亿元，推行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和多予少取放活方针，推

① 《邓小平文选》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257页。

② 《邓小平文选》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52页。

③ 《江泽民文选》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429页。

进城乡经济社会一体化发展。

第二，培育消费热点。1998年我国停止住房实物分配，逐步实行住房分配货币化，以此促使住宅业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不断满足城镇居民日益增长的住房需求。2001年国务院提出扩大旅游发展规模，进一步发挥旅游业作为国民经济新的增长点的作用。2002年《政府工作报告》提出，鼓励居民扩大住房、旅游、汽车、电信、文化、体育和其他服务性项目，培育新的消费热点。通过市场化改革，提高商品化率，扩大居民消费支出尤其是货币化消费支出，激励居民的潜在消费力转化为现实消费力。

第三，提高居民收入。1999年江泽民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指出，扩大内需“既注重投资启动，又增加居民收入，引导和鼓励消费”。^① 2001年全国整顿和规范市场经济秩序工作会议决定，适当增加机关事业单位人员工资，增强居民的消费信心，并且逐步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和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2003年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加大收入分配调节力度，重视解决部分社会成员收入差距过大问题。

第四，构建消费政策体系。2005年胡锦涛指出“要完善鼓励消费的政策措施，增加消费信贷，创新信贷品种，扩大消费领域，提高服务质量，促进消费结构升级，改善人民生活。”^② 为此，中央决定“果断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稳步提高社会保障水平，有序提升社会保障统筹层次”。2005年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的建议》，提出推进公共服务均等化，逐步构建促进居民消费的政策体系。

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提出“生产与消费直接相统一”的理论，“生产直接是消费，消费直接是生产”^③，并且提出“消费，作为必需，作为需要，本身就是生产活动的一个内在要素”。^④ 这一理论深刻揭示消费与生产的辩证关系，即生产决定消费的同时，消费也反作用生产。基于这一理论认识，“必须高度重视增加消费对拉动经济增长的巨大作用”^⑤，“坚持扩大国内需求，扩大消费拉动作用”^⑥，消费作为生产的“内在要素”及其对生产的“拉动作用”获得重视。因此，在我国发生历史性消费不足后，中国共产党把消费性质定位为消费是生产发展的手段：消费在社会生产的起点与终点环节发挥激励与约束作用，是社会生产循环进行的必备前提及必要手段，从而在一定程度上扭转并纠正了“生产单方面决定消费”的片面认识。不过，消费扩大政策重点在于刺激居民消费，目的是扩大居民消费支出，缓解国内市场供给过剩压力，实现市场供求平衡。但在居民消费需求基本满足、消费结构尚未大规模升级的前提下，仅凭扩大居民收入推动居民消费支出增长，而对提升居民消费质量、消费效能，进而培固居民扩大消费动力等深层次、根本性问题关注不够，导致政策激励效果未达预期。

五、消费升级政策：消费是经济发展的目的（2008—2012年）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标志着以发达国家为主体的国际市场不确定性显著提高，我国经济发展的国际贸易环境发生重大变化，“我们必须采取更加强有力的措施，真正把经济增长的基本立足点放到扩大国内需求上，利用这次国际经济结构调整的时机，加快形成主要依靠内需特别是消费需求拉动经济增长的格局”。^⑦ 由于单纯扩大居民消费数量及规模的政策效应显著降低，为此需要提升居民消费结构及层次，为生产发展创造更大空间，中国共产党的消费扩大政策转向消费升级政策。

第一，促进消费升级，实现市场扩容。2008年国务院办公厅发布《关于搞活流通扩大消费的意见》，推进万村千乡市场工程、推进家电下乡工作；促进城市耐用品消费升级换代；积极促进汽车消费；促进节假日和会展消费；促进安全消费；拓展电子信息、通信产品、教育培训、家政服务、文化娱乐、体育健身、休闲旅游等消费，引导个性化、时尚化、品牌化消费，培育和发展定制类消费。此后，

① 《江泽民文选》第2卷，第430页。

②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十六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6年，第1095—1096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5页。

④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第18页。

⑤ 《江泽民文选》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433页。

⑥ 《胡锦涛文选》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6年，第370页。

⑦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十七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9年，第760页。

相关文件密集出台，对发展旅游消费、绿色消费、循环消费、信息消费、服务消费、文化消费作出部署，创新消费模式，推动居民消费升级。

第二，推进新型城镇化，释放社会消费力。加快城镇化进程，提高人口城镇化率，对于提升居民消费结构、发展与释放社会消费力具有显著激励效应。“我国正处于城镇化快速发展阶段，城镇化不仅可以扩大投资，而且能够促进消费，对扩大内需具有重要推动作用。”^①为此，国家积极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和其他常住人口在城镇落户，深入推进城乡发展一体化，为经济发展提供强劲需求动力。

第三，健全社会保障制度，稳定居民消费预期。2009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关于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意见》，建设覆盖城乡居民的基本医疗卫生制度。此后，对农村居民及城镇居民的社会养老分别出台指导意见，把建立新农保制度作为“扩大国内消费需求的重大举措”。^②到2012年我国基本实现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全覆盖。建立健全社会保障制度，降低居民大额支出，稳定居民消费预期，有力促进居民潜在消费力向现实消费力的积极转化。

第四，培固消费动力，构建扩大消费长效机制。2009年胡锦涛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指出“必须坚持改善民生和扩大内需内在统一。发展经济的最终目的是保障和改善民生。”^③2010年党的十七届五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的建议》，提出“建立扩大消费需求的长效机制”，为此要完善收入分配制度，合理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着力提高城乡中低收入居民收入，增强居民消费能力；要增加政府支出用于改善民生和社会事业比重，扩大社会保障制度覆盖面，逐步完善基本公共服务体系。把扩大消费与提高居民消费满足程度结合起来，推动扩大消费长效机制的根本建立。

由扩大消费总量规模转为推动消费结构升级，中国共产党的消费升级政策具有重要指征意义：标志着我国居民消费由数量需求转向质量需求，也由此标志着消费服从服务于生产转向生产服从服务于消费，从而根本标志着消费对生产拉动作用转向引导作用，消费不再仅仅是生产的要素及前提条件，更为重要的是为生产提供目标与方向，在为生产发展创设增长空间的同时，引导生产优化结构，改进供给质量。“从根本上说，经济增长的真正和持久动力是最终消费需求，我们发展经济的根本目的就是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④为此，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对消费性质定位为消费是经济发展的目的，标志着消费优先发展，进而引导生产发展，为生产发展提供目标引导和价值评判。

六、消费提质政策：消费是人的发展方式（2012年以来）

消费升级政策目标是为生产发展提供目标引导，这需要消费实现一定程度的优先发展。在供给短缺状态下，消费发展取决于生产发展；而在供给过剩条件下，消费发展则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人的发展，才能实现相对于生产发展的优先发展。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习近平总书记多次指出“我们不再简单以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论英雄，而是强调以提高经济增长质量和效益为立足点”。^⑤经济增长质量与效益归根到底要以人的发展为判断标准。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提出“我们要着力提升发展质量和效益，更好满足人民多方面日益增长的需要，更好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全体人民共同富裕。”^⑥为此，中国共产党探索与创新消费提质政策，即推进消费发展，进而保障并促进人的全面发展。

第一，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发展先后以增长速度、规模、效益为目标，现在转向追求质量目标。党的十九大以来，“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⑦，“高质量发展就是能够很好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的发展”。^⑧2021年

①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十七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下，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第660页。

②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十七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第118页。

③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十七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第281页。

④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十七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9年，第725页。

⑤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4年，第436页。

⑥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3卷，北京：外文出版社，2020年，第133页。

⑦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3卷，第237页。

⑧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3卷，第238页。

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关于支持浙江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的意见》，探索“推进全民共同富裕，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的有益经验。“满足人民的美好生活需要”成为衡量及判断经济发展质量的根本标准，从而为经济发展提供目标引导及价值引领。

第二，扩大消费与改善人民生活品质相结合。2020年12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指出“要把扩大消费同改善人民生活品质结合起来，适应不同收入群体实际需要，以高质量供给提高居民消费能力和意愿。”^①2022年《政府工作报告》提出，提高产品和服务质量，强化消费者权益保护，着力适应群众需求、增强消费意愿。4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关于加快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的意见》，提出全面提升消费服务质量，在住房、教育培训、医疗卫生、养老托育等重点民生领域，强化消费者权益保护。改善人民生活品质成为消费提质政策的出发点及落脚点，从而开拓扩大居民消费的有效路径。

第三，提升消费质量与效能，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我们党领导人民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进行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根本目的，就是要通过发展社会生产力，不断提高人民物质文化生活水平，促进人的全面发展。”^②经济是否高质量发展取决于是否提升居民消费效能，而居民消费效能的提升归根到底体现为人的全面发展。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提出推进人的全面发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通过推动高质量、高效能消费，逐步推进社会主义条件下人的全面发展。

第四，生产发展、消费发展与人的发展相统一。“高质量发展应该不断满足人民群众个性化、多样化、不断升级的需求，这种需求又引领供给体系和结构的变化，供给变革又不断催生新的需求。”^③高质量的经济发展，推动高效能消费，高效能消费又推动人的全面发展；反过来，人的发展规定人的美好生活品质，为高效能消费设定目标，而高效能消费又为高质量生产提供目标引导与价值引领，从而构建生产发展、消费发展与人的发展的三方双向良性促进机制。

马克思不仅提出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的理想目标，也提出了人的现实发展方式，“私有财产的运动——生产和消费——是迄今为止全部生产的运动的感性展现，就是说，是人的实现或人的现实”。^④基于这一认识，中国共产党对于消费性质定位已经超越生产与消费的关系、经济发展手段与发展目的关系，而是将消费发展与人的发展联系起来，从而对于消费的性质获得全新认识及界定，即社会主义条件下人的现实发展的基本方式。如果说把消费作为经济发展目的，解决的是经济活动的价值导向问题——人们需要什么样的经济发展，即如何科学生产的问题，那么把消费视为人的现实发展方式，则解答了人们需要什么样的消费，即如何科学消费的问题。可见，消费提质政策是以人的发展需要规定消费发展的方向及目标，进而规定生产发展的方向及目标。因此，消费发展规律不再单纯接受生产规律的约束与限定，而在更高层面上接受人的发展规律的激励与引导。从这一意义上说，在供给过剩条件下，消费发展实质上已经转化为人的发展问题。

为此，新时代中国共产党消费提质政策的探索及确立遵循以下重要原则：第一，扩大、发展、提升居民消费与人的现实发展联系起来，推动人力资源的积累与提升，推进人的素养的全面发展与进步。第二，与资本主义社会只关注劳动素养与技能的培养不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在培养合格劳动者的同时，更要关注合格消费者的培育，使其消费素养与技能得到发展与进步。第三，从人的发展的现实目标出发，规范人的理性消费需求，进而向社会生产传递需求信号，确保经济活动理性，从而使生产发展、消费发展、人的发展内在联系与统一起来，社会需求导向机制得以构建并发挥积极作用。

结语

综上所述，中国共产党消费政策百年变迁实现了三次历史飞跃。第一次飞跃是从消费抑制走向消费放开，居民生活消费实现有效增长，与此同时经济发展的根本制约由生产不足转向消费不足，消费对生

①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在北京举行》，《人民日报》2020年12月19日，第1版。

②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论述摘编》，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7年，第19页。

③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3卷，第238页。

④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86页。

产的限制作用转化为保障及促进作用。第二次飞跃是从消费扩大到消费升级。消费发展从单纯消费规模及总量扩大转向居民消费结构及层次提升，为生产发展提供动力支持与目标引导，对生产的拉动作用转为引导与规范作用。第三次飞跃是从消费升级到消费提质，实现消费发展与人的发展的结合。消费的本质意义不仅在于满足人的生存性需要，更为重要的是满足人的发展需要。“我们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归根结底是要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①从这一意义上说，消费起初作为生产发展的条件和手段转化为生产发展的目的，进而上升为人的发展方式。由此，人的发展规定消费发展，并以此带动生产发展，从而构建生产发展、消费发展、人的发展的内在自洽的发展体系。

表 1 中国共产党消费政策历史变迁简表

消费政策	执行时段	发展背景	政策手段	调节关系	施策目标	消费定位
消费自给	1921—1949 年	战争封锁	限量配给	战争与生存	满足战时生存需要	消费优先保障战争需要
消费抑制	1949—1978 年	生产落后	计划供应	消费与积累	满足生产增长需要	消费是生产增长的约束
消费放开	1978—1998 年	生产增长	市场供给	消费与生产		消费是生产增长的结果
消费扩大	1998—2008 年	供给过剩	激励消费	供给与需求		消费是生产发展的手段
消费升级	2008—2012 年	消费发展滞后	消费结构、层次升级	经济发展手段与目的	满足消费发展需要	消费是经济发展的目的
消费提质	2012 年以来	人的全面发展	消费质量、效能提升	消费发展与人的发展	满足人的发展需要	消费是人的发展的方式

可见，中国共产党消费政策百年变迁呈现以下发展逻辑：第一，消费目标从物的增长到人的发展。由追求生产增长、消费发展到满足人的消费需求，再到人的现实发展，从而对消费的性质由浅入深、由低到高、从现象到本质，实现系统、科学认知。第二，消费模式从被动消费走向主动消费。我国居民消费理念、消费模式、消费行为发生根本变革，从节俭消费走向适度消费，从耻于消费走向乐于消费、从轻视消费转向重视消费、从低效消费迈向高效消费，消费的作用及效能凸显。第三，消费地位从生产决定到消费主导。消费从作为生产增长的约束条件到前提及手段，进而上升为经济发展的根本目的，最终体现为人的发展方式，消费相对于生产的关系得到根本纠正，即生产决定消费转向消费主导生产。第四，消费功能从平衡供求到价值评判。长期以来根据生产需要规定消费、评价消费，单纯发挥消费平衡市场供求的功能及作用。从作为生产的约束条件到目标引导、效能测定，更多体现的是消费对于社会生产的价值评判功能，即消费决定人们需要什么样的生产、如何进行生产，实质上是对经济活动施加人类整体理性作用。

“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鲜明提出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把增进人民福祉、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朝着共同富裕方向稳步前进作为经济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②中国共产党消费政策百年变迁的轨迹与规律对于消费理论研究具有深刻启示。不仅要在生产与消费的关系中认识并定位消费，还应在消费发展与经济发展、消费发展与人的发展的更高层级的关系中正视消费的作用，才能更为深刻地认识与把握消费发展规律：在生产不足条件下，消费依附于生产，生产发展决定消费发展；而在供给充分条件下，消费优先发展——根本体现为消费需要的创新发展，从而为生产发展提供潜在空间，消费发展的独特规律得以呈现。如此，生产发展的瓶颈依赖消费发展突破，而消费发展的瓶颈则需要人的发展突破，即人的发展不断更新、创造消费需要，从而推动消费发展，进而带动生产发展。因此，生产发展、消费发展与人的发展实现内在的联结与统一。

(责任编辑：冉利军)

① 《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北京：人民出版社，2020 年，第 54 页。

② 习近平 《论把握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第 62 页。